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黄文富.新时代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文学实践[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5):46-51.

新时代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文学实践

黄文富

(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广西 南宁 530023)

摘要:民间化叙事是当代作家常用的一种叙事策略。东西创作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以老百姓的身份,从老百姓的视角,按老百姓的逻辑,用老百姓的语言,书写老百姓的生活。小说富有个性和张力,充满想象、荒诞、戏谑,富有深刻性、趣味性、可读性,展示了民间化叙事的强大能量,展现了东西的乡土情怀和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写作姿态,不失为新时代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文学实践的成功写作模式。

关键词:东西小说;篡改的命;民间化叙事

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5-0046-06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民间化叙事是当代作家“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重要体现、重要实践、重要途径。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叙事是指民间大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叙事活动,既包括民间大众日常的叙事活动,也包括民间大众集体创作,在民众之间口耳相传,反映民众思想情感的民间文学创作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写作,其叙事活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叙事,但作家作为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一份子,在创作活动中他可以隐藏自己的知识分子角色,采取民间立场、民间视角、民间语言等民间化的叙事策略进行叙事,体现出民间化的叙事姿态,也就是莫言所说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1]。民间化叙事与官方叙事、人文叙事三者之表征差异主要在于叙事立场、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语言的不同。^{[2](P8)}民间化叙事更强调民间立场、民间视角、民间趣味、民间审美、民间视界。东西创作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充满想象、荒诞、戏谑,富有趣味性和可读性,是一部扎根人民、扎根生

活,民间化叙事趣味十足的作品。目前学界对这部小说的关注较少,且都是一些综合性的评论,关注其民间化叙事的研究仍为空白,而民间化叙事作为当代作家创作尤为关注的热点,理应得到关注和探讨。本文拟关注这部小说的民间化叙事,总结反思作者在民间化叙事方面的成功探索和实践及不足,以期学界和广西创作界提供可供借鉴的参考。

一、平民、人性、世俗的叙事立场

叙事立场是界定叙事形态的重要因素。所谓叙事立场,简单地说,就是作家站在什么样的地位或以什么样的身份,持什么样的态度来写作的问题。坚守平民立场、人性立场、世俗立场,是当代作家民间化叙事一贯的写作姿态,也是衡量作家民间化叙事的三个重要维度^[3]。东西创作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讲述了桂西北一个农村家庭把进城改变出身作为改变卑微命运的独木桥,却因招工、高考上大学等被人冒名顶替,想进城打工改善生活又因为一系列的机缘巧合而四处碰壁,导致一家人命运被不断篡改,最终无可奈何将下一代送到城里有钱人家寄养,

收稿日期:2024-0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百年中国文学‘底层叙事’研究”(20BZW146)

作者简介:黄文富(1964—),男,广西南宁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关系、铜鼓文化研究。

从而实现第三代人城市身份的故事。小说叙事自始至终坚守了平民化、人性化、世俗化的叙事立场，彰显了作家对民间化叙事的追求。

平民立场是作家民间化叙事的重要体现和主要策略。它要求作家把老百姓当作叙事的主体，用老百姓的眼光看事情想问题，用老百姓的耳朵听事，用老百姓的嘴巴说事儿，以在场老百姓的身份客观、真实、原汁原味地呈现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生活姿态和生命形态。^{[2](P15)}在叙述汪槐一家日常的生产生活时空及其所处的桂西北乡间生活时，东西将自我的“他者”身份隐藏于老百姓之中，给读者感觉叙事者是一位与汪氏父子同吃同住的当事人，这个“在场”的当事人俨然成了叙述的主体，作者的“他者眼光”被完全隐藏，看不到作者作为知识分子角色的在场，可以说是做到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1]。这是东西平民化叙事的体现。

弱者有弱者的想象。弱者的处世思维往往充满着底层弱小者的自我想象和意淫，想象着强者对自己的怜悯和同情，经常以自虐的方式来博取强者世界的关注，但实际上强者世界根本就没把他们当回事。比如，汪槐怀疑其儿子被冒名顶替上大学时，为逼迫教育局能给一个上大学指标，他烈日下举牌跪了数天，想象着这样可以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在静坐、下跪无人理睬时，以跳楼相威胁，以为局长能出来解决，结果摔成重伤，但教育局的人依然不理睬，甚至摔伤了都没人帮他打电话叫救护车。又如，汪长尺返校补习，因饥饿去找同学黄葵混口饭吃，以及到后面一系列阴阳差错处处碰壁的故事，让读者看到自我尊严和他者的尊重对于弱者而言不过是自我想象和意淫。作者“留影机”式地把这一家人的故事冷峻地记录下来展示给读者，其叙事极为冷静，平民姿态显露无遗，民间趣味自然流露。

底层者有底层者的逻辑。民俗化的思维方式是底层民众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方式。小说中汪槐一家所处的乡土社会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语言文化、精神信仰、生活习惯等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方式，他们的精神信仰充满迷信和唯心。为了让汪长尺考上大学，汪槐每天都要烧三炷香，供香时他只求汪长尺能考上大学将来做大官；平时连蚂蚁不敢踩，鸡都不敢杀，害怕做任何不洁的事情招报应导致汪长尺考不上大学；见谁都让三分，别人把祖坟的地儿给贪占了也不敢争，逆来顺受，认为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是在为汪长尺能考上大学积德积善。这些叙述把汪

槐夫妇对高考上大学的精神寄托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把那个年代中国底层民众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社会现实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民俗化叙事是东西民间化叙事的一个重要表现，通过民俗化的场景、情节和语言，体现民间叙事平民化主体的在场。这是文学敢于面对残酷社会现实的体现，也是东西扎根于人民、扎根于生活的文学实践。

从人性、世俗的维度来看，《篡改的命》人物形象塑造也显现出趣味十足的民间化叙事倾向。在描述小说人物的时候，东西更加关注人性和世俗的一面，直击主人翁作为人的属性，关注主人翁的生存、生活、生理等作为人的一切需求，把表现人性和普通老百姓日常的、底层的、普遍的、世俗的一面作为叙事的初心，而作为普通平民之外的制度身份、政治身份、阶级身份或者政治叙事、精英叙事语境下的其他身份，作家似乎完全不关注。比如，文中多处出现的“饥饿叙事”：汪长尺每天只吃盐水泡饭，每日一餐，饿的时候喝自来水，自来水喝多了也不管用，于是在水中兑白白糖，每天拎着自制的糖水去上课，因为越来越饿，对水的需求就越来越大，经常一节课喝一瓶水，水一多就需要排泄，排泄一多身体就虚；（汪长尺）饿的时候感觉书本上的黑字变成虫子一样乱飞，不用说记这些字的内容，光看它们的形状都觉得冒汗，他每天跟眩晕、失忆、哈欠、瞌睡、疲惫抗争，为了节约体力，他不作早操和眼保健操，课间休息都是闭目养神，这些饥饿体验让他痛彻地明白“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任何理想没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无机盐和水的支持，那都是空谈；他甚至为了填饱肚子去加入同学的黑社会公司，顶替别人坐牢，拿名声去换取生理需求的满足。作者多处提到他的饥饿感，生动地叙述主人翁人性与世俗的一面，让读者看到汪长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现实中最人性的需求，这些需求尽管很世俗，没有什么高大上的价值导向，也无法站位于精英阶层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但却是最实在、最符合人性的需求。作者以世俗化的叙事姿态直达人性关怀的深处。

二、全知、全景、非常的多重视角

叙事学认为，叙述是写作者运用语言媒介将一系列事实或事件及其相关关系传递给受众的传递行为和过程，在这个传递行为和过程中，叙述者往往选择一个相应的角度来展开叙述，这个角度便是我们通常说的叙事视角。^{[2](P65)}按不同的角度来划分，叙事视角可分为全知与限知、全景与局部、非常与正常

等不同的视角。随着民间化叙事越来越成为作家追求作品新奇性、趣味性、可读性的叙事策略,叙事视角显得越来越重要。一个适得其所、恰到好处的叙事视角往往可以让作品推陈出新,充满趣味和意味。

《篡改的命》是一部充满趣味性的作品。这种趣味性体现在故事情节、叙述语言、人物塑造等多个方面,民间化叙事视角的选择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从语义上看,“篡改”是“窃取”的行为,是见不得人的“贼”行,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是在封闭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隐秘活动,如果是光明正大地做,那就是改写、改编、修改,不叫“篡改”。按常理来说,既然是隐秘的行为,对于叙述的事件应该是限知、局部、正常的部分,隐秘的部分不可能观察得到,但《篡改的命》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隐而不秘”的可能。小说情节的叙述中,东西的观察视线可以说是无孔不入,视角直达人性的深处、痛处和人物内心的隐秘地带,该展现的都给予了充分的展现,让人感觉故事中的主人翁和人物生活的世界似乎已经没有了隐私,一切都被叙述者赤裸裸地扒开了给读者看。尤其是对汪槐一家及所处的村庄隐晦、私密空间的叙述极为细致,各种隐秘的细节和人物内心的隐秘地带,都叙述得极为透明。小说的笔锋就像无死角的手电筒,全方位地照射进小说场景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所有主人翁的私生活都被扒光,不留一块遮羞布。

作者这样不留情面的叙述显然是选择了全知、全景、非常的视角来介入小说人物和生活场景。从民众自在的生活时空来看,底层民众不会有贵族般地追逐优雅生活的姿态,他们的需求往往是一日三餐、健康平安和简单快乐,对真善美假恶丑的认知也是简单、直接、对立的,对广大民众生活时空的叙述自然都是些简单、琐碎、世俗的日常,甚至还有一些卑微的苦难、个体化的隐忍和抗争,但恰是其简单、琐碎、世俗、卑微,方显民众生活的本真。东西这种多视角重叠尤其是全知、全景视角的双重介入,把作为底层民众代表的汪槐一家的窘困和艰难、卑微与渺小、隐忍与抗争表现得淋漓尽致,充分展现了底层社会个体的艰难处境,避免了政治叙事和精英叙事那种预设的、主干的、大方向的、过滤式的叙述所产生的假大空和不真实感、片段感,凸显了民间化叙事视角所带来的趣味性、可读性。毕竟,现实生活本身其实是充满想象、生动形象的,细节的叙述让故事更具可读性。这种细致入微的细节叙述源于东西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心思极细的审视。对汪槐一家小场景、小生活的境况细致入微地进行描述,更能真

实地反映出特定时代背景下主人翁所代表的底层民众的生活境况。在这里,我们看到东西坚守了底层社会民间身份的在场,把自己作为桂西北小乡村中的一员,全权限记录那里人们的生活,而不是把自己作为记者一般,把走过路过的内容记录下来给予展现。东西显然是隐藏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把自己作为小说人物生活场域的在场者,作为一名实时在场的老百姓,叙述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情感世界,做到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1]。

三、反讽、圈套、错位的叙事结构

叙事结构简单地说就是叙述的布局。民间化叙事是作家刻意的写作姿态,是不同于日常叙事的创作活动,它是叙述者有意识、有谋划的叙事行为。民间化叙事作为叙事的重要策略,十分讲究叙事结构的谋篇布局,反讽、隐喻、圈套、错位都是民间化叙事常见的结构范式^[3]。东西对《篡改的命》的叙事结构做了非常精心的设计和谋划,不管是叙事语言、故事情节、人物塑造,还是叙事事件的时空安排、背景结构、叙事逻辑等,都充满了反讽、圈套、错位的意味。

反讽是《篡改的命》较为明显的民间化叙事手段。作为民间化叙事结构范式的反讽,不仅表现在语言方面,还表现在小说的叙事结构方面。比如:汪长尺为安抚帮了他的村民去县城派出所自首时,汪长尺跟警察之间的对话暗含着对彼此的鄙视、嘲讽和相互防备、排斥;当王东想把汪槐家唯一值钱点的棺材拿走时,汪槐说那是给我准备的,你这么年轻不会比我早死吧,等等。这些属于语言上的反讽,要么是正话反说,要么是充满戏谑和调侃,语言风格颇为俏皮,反讽意蕴入木三分。叙事情节方面的反讽意味,如汪长尺把他爹写给左邻右舍的欠条上的名字更换成自己之后便出去打工,结果大家看到汪长尺去打工了,以为汪长尺要逃跑了,提前拿着借条来向汪槐索债,刮油盐的刮油盐,抬柜子的抬柜子,扛棺材的扛棺材,伐木头的伐木头,抵押宅基地的抵押宅基地,把汪槐一家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现抵债。这表面上是叙述汪槐一家的艰难,实际上是对村民势利眼和乡情冷暖的反讽;又如,汪长尺把儿子送给有钱人家养,希冀以此实现下一代的城市出身,但具讽刺意味的是,接受他寄养儿子的竟然是他的仇人林家柏,最后他还被林家柏逼上绝路。小说在反讽汪长尺失去做人底线的弱者思维的同时,还极大反讽了看似大获全胜的林家柏。因为汪大志是汪长尺的儿子,其出身的篡改实质上是对林家柏财富成果的

窃取,林家柏的结局看起来好像是坏人并没有受到惩罚,实则是“替人做嫁衣裳”,汪大志被篡改后的另一个身份其实某种意义上说是林家柏的掘墓人。

叙事中的圈套结构是《篡改的命》民间化叙事的一个重要表征。小说通过不断设置圈套的方式展开故事情节的推进,叙事套路充满叙述者的“阴谋”。对于汪槐一家而言,进城是改变他们现实处境的有效途径,为此他们尝试通过走高考“独木桥”来实现进城的目的。汪长尺第一次高考疑似被人冒名顶替,第二次高考又没上线,只好放弃了走高考“独木桥”,想通过进城务工的方式,在城市扎根立业,从而让孩子(第三代人)能在城市出生。但城市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一个个陷阱,这些陷阱以圈套的方式出现在他们“城市化”的道路上。作者在小说开篇就以倒叙的方式,用不到 500 字的文字叙述了汪长尺准备跳桥的彷徨与挣扎,但并没有叙述完整的情节。主人翁汪长尺为何突然有这种行动,他是否真的跳桥了,如果真跳桥了是否会被救起来,等等,都没有叙述,而是设置了一个巨大的悬念,引诱读者从第一章开始阅读寻找答案,并在往后的正叙中不断出现惊奇、震撼、惊喜、无奈等,形成一环扣一环的叙述套路,诱惑着读者一步步地去了解主人翁汪长尺的“城市化”之路。作者设置的各种引子、悬念、玄机、错觉、意外、惊喜等引诱着读者一步步地进入“圈套”。

对错位结构的精致运用也是《篡改的命》的一个重要特征。小说单是题目就给人一种强烈的错位感,故事从一起被冒名顶替的篡改事件开始讲述,在一系列的错位事件中步步展开情节,最后以错位的事件来把情节推向高潮并结尾。小说主人翁汪氏父子是勤劳苦干、讲人情讲道义、吃苦耐劳的底层人物形象,他们勤劳苦干想改变出身,以读书求变,相信知识改变命运,这本来可以是一出屌丝逆袭的励志故事,奈何在错位的时空里,屌丝的努力奋斗史变成了四处碰壁史,现实中一系列错位的意外事件导致屌丝的命运被不断篡改,形成理想与现实的反差、物质与精神的失衡、欲望与伦理的冲突,并最终导致主人翁汪长尺走上一条不归路。自始至终,《篡改的命》通过不断设置错位和圈套来展开故事情节的讲述,汪槐、汪长尺、刘双菊、贺小文一家每个人都存在着情感、伦理、理想、现实之间的错位和纠葛,最后是汪长尺的儿子汪大志把错位的情节推向了高潮。汪大志是汪槐、汪长尺父子两人改写家庭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按人类正常的情感和思维逻辑来说,汪大志发现其亲生父亲案件存疑和自己的身份被篡改

后,应当及时查明原因,惩罚恶人,为亲生父亲讨回公道,给爷爷奶奶一个交代和安慰,但汪大志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偷偷销毁了亲生父亲的案件卷宗,还偷走留在爷爷奶奶家里的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彻底清除一切证明自己与亲生父亲关系的痕迹。作者故意把情节向亲情伦理和现实物质生活相矛盾的方向设置,让汪大志的所作所为不按正常逻辑走,而是再来一个错位,给读者一个令人窒息的结局,以此把城乡冲突之下的城乡矛盾、社会伦理失范、人们过度物化等导致的人性和亲情的异化等问题彻底地揭露出来。

四、大众、地域、民俗的乡土语言

民间化叙事相对于政治化叙事、精英化叙事而言,是一种以民间视角、民间立场、民间趣味为导向的叙事形态。^[3]它拒绝政治叙事的“高大上”说教和精英叙事高高在上的价值评判、“思想启蒙”,要求去精英化、去政治化,追求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底层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和审美习惯。叙事语言是反映小说叙事形态最直接、最直观的符码。民间化叙事语言则是最贴近民众的语言,它是作家修辞处理后的语言,包括对民间俗语、民众日常语言、方言、民族习惯用语等的运用,具有日常性、地方性、口头性、粗鄙性、随意性、戏谑性、民族性,混杂着大众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情感。“从叙事话语特色来看,作家文学中的民间化叙事语言风格追求‘眼光向下的’‘民间趣味’,强调地方性知识和经验的植入,突出民间化、地方化审美和大众化趣味的价值取向。”^[3]

《篡改的命》可以说是一部用社会底层人的语言叙述底层社会人生活的小说。小说讲述的是乡土人物“城市化”的过程。小说主人翁是乡土空间的人,叙事的基调以乡土社会为根据地,这也是该小说民间化叙事的时空场域。在乡土空间场域中,我们看到胆小懦弱、愚昧落后、朴实善良、任劳任怨的主人翁人物形象,他们身上带着浓重的“泥土味儿”:说话“泥土腔儿”、穿着“泥土气儿”、处世思维“死土”、性情“老土”等。这些“泥土味儿”不管是在乡土时空里,还是随着空间位移到城里,都与主人翁形影不离。从语言文化特质来看,与他们这些“泥土味儿”相应的是渗透在他们血液里的乡土语言生态。民间化个性则是这些乡土语言的最大生态。汪槐骂汪长尺“你个没骨头,不是我的种,你是一枚软蛋”,“你这个没出息的货,你这个不争气的家伙”,“(你个)野仔”,汪长尺自我抱怨和自责“拉不出屎怪地硬,要怪

就怪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一坨狗屎”，“我他妈的就是一截死木头”，“我 TM 没那本事，我 TM 没那胆量，我 TM 太胆小、太懦弱，太 TM 对不起人类”。这些口头的、日常的、简单的、粗鄙的、俏皮的语言，是一种没有经过过滤的、泥沙俱下的叙事话语，是民间逻辑的直接反映，具有较强的生活性、随意性。这种语言风格代表的是广大民众追求宣泄、简单、直接、狂欢、戏谑的言语生理机制，通过直抒胸臆或反讽戏谑的方式，把内心的思想情感直接宣泄出去，达到降压缓闷、身心舒适的生理效果。

对民间语言的升级改造，是东西民间化叙事语言的一个重要特色。东西是一个非常注重语言试验的作家，在语言对现实的塑形与改造、语言与权力的转换和生产、语言状态与生存体验的隐喻、语言风格与意义认同的指向这四个层面上，其小说持续地在不同的叙述环境中试验语言行为的能量^[4]。《篡改的命》中经常可以看到东西对民间俗语的改造和转换使用，包括对民间口头禅、民间歌谣、流行语、歇后语等的使用。如：汪长尺心里骂仇人林家柏时化用了当地民间俗语和民间歌谣“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肉食者毒”“池塘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草也枯”；汪槐劝告村民停止对抗警察执法时用了民间俗语“你以为很多时候硬是真硬吗，是尿撑的”，骂汪长尺不争气时引用的歇后语“秃头的男人卵毛长，跟你对着干”和地方口头语言“你没骨头，不是我的种，你是一枚软蛋”等。这些富有特色的民间语言十分生动、形象，符合民间大众的审美趣味、思想情感和思维习惯。这种具有口头性、粗鄙性、日常性的大众化语言和民间谚语、俚语、口头禅、歇后语等，从内容上说是属于老百姓的语言，语言风格贴近老百姓风格，能更好地反映老百姓的思想情感和思维习惯、审美趣味，老百姓能在这样的民间化语言中找到熟悉的语言感，作者对这些语言的改造升级使用，使表达效果更生动、传神、有趣。正如黄永林说的那样：“小说家对民间语言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提升，可以追求具有特定语感的民间语言去营构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小说体系，使民间语言的运用和地域文化精神的表现紧相维系、互为表里，从而收到特殊的表达效果。”^{[5](P145)}

相对于城市空间而言，乡土社会可以说是底层的、弱势的，甚至是落后的、闭塞的，与这种乡土社会相对应的是与城市生活存在较大差异的乡土语言。东西扎根于南方边地写作，吸取来自民间的、大众的、地域的、民族的语言营养，用民间化的语言系统

讲述民间底层大众的故事，这些大众化、地域化、民俗化的叙事话语充分体现了他的民间化叙事策略。

五、探索与实践中的民间化叙事

民间化叙事从本质上看是艺术源于生活的内在要求，是文艺作品人民性的重要体现，也是文艺创作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具体实践。^[3]曾经的乡土社会生活经历，让东西有着浓厚的乡土情怀，这种乡土情怀是他民间化叙事语境生成的土壤。《篡改的命》“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以老百姓的身份，从老百姓的视角，按老百姓的逻辑，用老百姓的语言，书写老百姓的生活，富有个性和张力，充满丰富性、生动性、深刻性、趣味性、可读性，让我们看到了民间化叙事的强大能量。作者对作为社会底层代表的乡土社会的观察是细致入微的，对老百姓的思想情感、生活习惯、民间风俗等有着很深刻的了解和体验。可以说，《篡改的命》是新时代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文学实践的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西创作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在民间化叙事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是相当成功的。

如果说一部作品是完美的，那大概率是商业吹捧。本着客观讨论的原则，笔者认为《篡改的命》之民间化叙事仍然存在些许值得继续探索和深入实践的空间。比如小说中有些人物语言缺乏情境化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小说人物语言的硬搭方面。如：出自刘双菊之口的“二次受伤”，在 20 世纪末，红水河流域一带的乡土社会仍然是一个十分闭塞落后的空间，这种台词出不了刘双菊之口，人物语言不符合情境；出自汪槐之口的“三无人员”，是城市精英意识提炼下的台词，是精英阶层、强势阶层对社会底层人员、弱势群体的叙述，出自汪槐这种底层人员之口并不是特别贴切，农民群众最常见的表达一般是“你什么都没有”，非常简洁明了、通俗平淡，更符合人物身份和情境；汪槐讲汪长尺的台词“(他们)明年照样把你当韭菜来割掉”，“韭菜”一词在社会上的广泛使用与股市有很大的关系，而且还是 21 世纪才开始大面积流行的语言，这种台词与小说人物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及人物身份的搭配显然让人觉得生硬和不协调。诸如此类具有高度概括性和知识化、精英化的语言，既不是地方语言，也不是民族语言，更不是底层社会的民间语言，并不符合城乡冲突下的乡土人物身份，与小说故事情境也不符。此外，工友刘建平为汪长尺送行时说“阿门”这样的西方宗教语言，显然不符合刘建平这种红水河流域壮族乡土社会人物

的情境。时尚语言、地方语言、民间语言等混搭和改装使用可以说是近年来一些广西作家创作追求标新立异的一个方式。混搭不算太大问题，但混搭不等同于硬搭，语言的混搭很多时候可以达到某种意想不到的表达效果，而硬搭往往是败笔。《篡改的命》中出现的这种语言硬搭现象，或许是作者故意迎合当下阅读心理而刻意以此作为亮点去追求，但笔者读起来确实觉得生硬、不自然，这种缺乏情境化的语言应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作者的平民化叙事。总之，也许这是一种还在探索与实践路上的民间化叙事。

即便如此，瑕不掩瑜。因为有《篡改的命》这样颇具高度的探索与实践，我们有理由期待，作者能够

在往后的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文学实践中创作出炉火纯青的民间化叙事文本。

参考文献：

[1]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J].当代作家评论,2002(1).
[2]晓苏.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
[3]黄文富.地域、民族、民间的新时代表达——关于“骏马奖”广西获奖作品[J].南方文坛,2021(4).
[4]陈舒劼.言语的能量：以东西的小说为中心[J].社会科学论坛,2012(12).
[5]黄永林.大众视野与民间立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

Literary Practice Rooted in the People and Life in the New Era

Huang Wenfu

(Guangxi Institute of Ethnic Culture and Art, Nanning Guangxi 530023)

Abstract: *The Tampered Life* by Dongxi employs a folk narrative strategy that vividly portrays the lives of grassroots individuals, blending personality, tension, and humor. This imaginative and absurd storytelling captures local sentiments and reflects the writer’s deep connection to his community. By rooted in everyday experiences, the novel exemplifies a successful literary mode that resonates with contemporary readers and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people’s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Dongxi’s novels; *The Tampered Life*; folk narrative